上海文庙儒家文化研究丛书



# 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 ——与孔子对话

RUJIA WENHUA
YU XIANDAIREN DE JINGSHEN SHENGHUO
YU KONGZI DUIHUA

朱贻庭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CONTENTS


1……编者的话

1……民族道德文化：从传统到现代　高兆明

20……仁者不忧

——破解现代人“烦恼”的大智慧　夏乃儒

37……从儒学看现代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　施忠连

52……超越功利　提升人格

——论道家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与儒家的“内在超越”之路　朱贻庭

68……论儒家忧患意识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朱义禄

85……创新儒家文化　培育时代新人　祝瑞开

99……时代呼唤传统孝道回归

——从孔子的孝道说起　陈增辉





113……儒家“中和”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杨　明
126……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以现代爱国运动自杀人物的评论为例
刘长林
144……简述梁启超的“儒学作用”论
陈泽环
158……张君劢的精神真空论　顾红亮
171……存三祭　通幽明
——试论唐君毅先生的儒家宗教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罗义俊
192……“文”与“神”：荀子对原始宗教巫术的态度
——以“天论”、“礼论”为中心　东方朔
209……试析孔子君子论的两重性　陈卫平
226……“易儒文化”对中国管理精神的塑造　施炎平
242……“人伦日用”的现代转向下的“儒家之道”何以可能？　段江波
265……在中西文化传统比较中诠释儒学的实质与核心价值　邵龙宝
283……《中庸》诚的哲学　余治平
298……论孔孟德性论的现代意义　孔文清
315……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　李承贵





337……中国文化重心转移与儒学的现代命运　周　山
344……作为政治学对象和范畴的“德”
——以《尚书》为例　马德邻
359……春秋末年以前善恶对立观念及概念的形成　吾敬东
374……从“五伦”到“五缘”
——略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　林其锬
383……共生视野下的儒学与民间传统
——以孔庙为例　胡守钧　徐　畅



# 编者的话

从现实出发，带着当今社会的现实的问题，与孔子和作为儒家文化人格化的“孔子”进行对话，是上海文庙历届儒学研讨会的基本模式。已经出版的反映4届上海文庙儒学研讨会成果的4本文集，就是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以“对话”的方式，从不同方面去发掘儒家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现了上海学界研究儒学的风格和特点。这次出版的“与孔子对话”主题为“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是第四集“与孔子对话”的主题“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延伸和深化。

毋庸讳言，在今天，由市场机制、资本魔力激发起来的唯财富、享乐是求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正严重地冲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平庸的感性享乐消解着理性的道德审视和伦理精神；在物质财富不断丰裕的同时，人们的内在精神生活却日显贫乏，导致心理的浮躁、焦虑、孤独、烦恼和人格的扭曲，找不到精神安顿之处，失去了支撑精神生活的价值之源。人们陷入了为物所役的深渊，成了金钱功利的“心奴”，丧失了人的精神价值。如何“自除心中之奴隶”，从为物所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就“我”的自由人格。这在今天似乎更加突出地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中心议题，是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严峻挑战。

2009年9月上海文庙第五届“与孔子对话”儒学研讨会的主题定为“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就是带着现代人精神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活——内在精神生活的各种问题，通过“对话”，推寻蕴涵于儒学思想体系中能够给现代人重建自身精神价值以启示的人文资源。

毫无疑问，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儒学，其“内圣”功夫，体现了成就理想人格即所谓“成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这里有十分丰富的积极的值得我们现代人发扬光大的人文资源。经编者的筛选而汇集在本书中的论文，都是各位学者自己研究的心得，其中有些论文所提出的观点，在研讨会上已经有过交锋，甚至出现激烈的论辩。我们尊重作者的观点，除了因文章过长而请作者压缩的，凡合乎“主题”的论文都收编入集。欢迎学界和读者对文集中的论文提出批评意见，共同推进儒学研究的发展。

编者



# 民族道德文化：从传统到现代

高兆明

## 一、问题的提出

1. 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探究：现代（道德文化）如何与传统（道德文化）对话？传统（道德文化）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进入现代（道德文化）？传统（道德文化）如何在现代（道德文化）中发展？发展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会是什么样？

一个伟大民族最重要的不在于物质上的富有，而在于有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民族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种民族精神既是这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处所，亦是引领这个民族挺立于世界前列的灯塔。

经过这30年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问题又一次被历史性地提出。在物质财富有了空前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同时，社会事实上存在着某种精神离散、灵魂分裂的杂乱、迷惘与苦恼现象。这是文明“再生”中的迷惘与苦恼。[①] 我们这个民族在现

①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7—19章，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塑造的问题。建立起与中华民族现代化相适应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路径。当代中国的道德精神、道德文化只有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这一背景中才有可能真正被把握。

2. 汤因比在论及文明的历史演进时曾揭示：一个文明总是在成功应对挑战的过程中生长。[①] 道德精神生活作为文明的一个具体领域，自然亦不例外。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论争：体用、本末之争，科学与民主之争，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这种思想论争的集中爆发与体现，更是自觉新文化运动的肇始。隐藏在这一系列思想论争背后的，是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反思、革新与求索。20世纪50年代中的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之争，也是这种探索的一个继续。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反思、革新与求索亦持续不断：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争（以《河殇》为代表），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以及时下正在兴起的国学热。这种反思、革新与求索本身表明：这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有赖于民族精神的勃兴；作为这个民族精神生活有机环节之一的道德生活、道德文化，只有在民族精神振兴这一大业中才能真正健康清明。

3. 思考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民族（道德）文化问题，有三个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思想前提。

---

①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5部，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其一，这种（道德）文化的民族传统之根。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必定有其内在精神传承，正是这种精神传承，在凝聚着这个民族并构成其历史的同时，又为整个人类文明宝库做出卓越贡献，赢得其他民族的敬仰。如果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时不能珍视、呵护与光大自己的这种文化之根，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在自毁根基。这不仅不能实现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反而会在现代化的时髦外衣之下空壳化；不仅不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反而会使古老文明大厦倾没。

其二，这种（道德）文化的现代化之时代性。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文化有其特有的历史承载，它总是某种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它的辉煌存在于那个历史时代。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它昔日的辉煌已黯然褪色，它须在烈火中涅槃，寻求新生。如果它不能获得现代化这个时代的规定性，如果不能成为具有现代化的文化类型，那么，它就失却生命力。

其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肇始的新文化前进方向。20 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构成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尽管我们可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做出不同的分析评价，但是，在总体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前进方向，它是新时代的开端。在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新生中，不能无视、更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民族性与时代性，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上述三个思想前提的两个实质性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时代性的进一步拓展。民族性（民族精神）与时代性（时代精神），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华民族道德文化问题时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价值立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二、生长着的民族道德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1.“民族道德文化传统”中的“传统”不是在编年史、“历史结构”这一类外在意义上而言，而是在存在者的“整体性的存在意义”[①]、民族长期演进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精神内容这一实质规定的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传统是生长着的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事实上都会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构成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并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质。

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民族（道德）文化首先须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它是民族自身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

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②] 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自然存在物只有空间，自由精神具有时间性。时间性表明自由意志活动的绵延。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存在，不是人的自由存在。时间就是绵延的生命体及其厚重的内蕴，就是历史。在时间中，我们获得了自己的家园，并有了存在的生命之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民族的历史以及民族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当下性则是民族历史在当下的书写。一个民族历史在当下的书写，则是这个民族及其精神的时代性。传统在每一个

①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38—441页。

② 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历史阶段，总是以那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为内容。正是民族历史及其精神中的时代性，在构成了民族历史及其精神的质的规定性的同时，亦规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民族历史及其精神中，必定内蕴着时代性，民族历史及其精神正是在时代精神的发展中前行。

民族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得以保存与发展的精神基地。民族家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向度：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当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道德文化传统，它是这个民族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现实统一体。

2. 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历史、生长着的民族精神。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否定并创造着自己的传统。一个有历史的文化创造过程，是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统一。中断性是飞跃，是文化创新；连续性是统一，是文化的生长。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在建设新世界时必须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对此须有准确合理理解。任何一种文化观念总是某种社会生活方式与交往活动关系的产物，并总是要维护某种社会生活方式、交往关系。传统观念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并总是要维持那种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否定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就必须否定传统的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有质的区别。不在质上否定既有的历史阶段与文化类型，就不可能有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的飞跃。在这个意义上，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开始一种新的历史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段，就必定要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不肯定这种内在联系，就无法理解新的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形成，就不能与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这样，对于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理解，就只能是内容、质的意义上的，而不能是外在形式、量的意义上的。这个“彻底”不是绝对无规定的，而是有规定、有条件的：这个“彻底”决裂是相对于既有传统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类型的那种质而言，它是要否定那种既有的旧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类型，是要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类型。因而，它并不内在地拒斥对既有文化的继承。它既有决裂，也有继承，它是批判中的继承；它是辩证的否定，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向人们揭示：要建立一种与新生活相适应的新（道德）文化，就必须告别旧（道德）文化，在质上否定旧（道德）文化；这种否定不是彻底全盘否定，而是在质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有继承性的否定。使那些以特殊形态存在于传统文化旧质中的、具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内容，通过去除旧质，赋予新质，进而为新质服务，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

民族文化的任何一种具体内容，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就是民族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民族文化内容及其形式。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构成这一时代的文化不同于其他时代文化的基本区别，这是文化价值精神的核心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这种文化价值精神的具体承载与标记。民族精神存在于、并通过民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表现于外。“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





的标记。”[①]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就是在那个具体形式中存在着某种共通的人类精神文明财富，这个精神文明财富，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通过批判、否定，找出并继承隐藏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内容，这是民族文化传统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

3. 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既是民族历史的，又是时代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必定内蕴着时代精神。一个民族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内容。能够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存在的民族文化，总是具有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亦是一个生长着的概念。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时代精神自身也会经历一个内在否定性过程，既有的失却合理性，并生长出新的内容。这样，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但是，在文明演进过程中观之，真正能被称之为时代精神的，只是那些具有现实合理性根据的时代精神。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以“契约关系”（而不是“身份关系”）为基础的自由精神。

每个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都会创造着自身的新文化。一个不能创造自身新文化的民族文化，缺失内在生命力。能够创造新文化的民族，才能创造自身的未来。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必定会在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出现代化的新文化，并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发展自己的传统。

传统在当代的发展，首先就有一个发展的方向问题。这个发展方向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上得到规定。即，它

①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 66—67 页。





既须有民族精神，又须有时代精神。它是这个民族精神在现时代的生长。没有民族精神，丧失了民族传统，使其直接失却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场所的根据；没有时代精神，则意味着这是一个失却生命力的文化，亦不配做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正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才不仅使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在历史中生长，而且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能够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作为一种文化而不是作为一种学说、思想的中国传统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儒学的价值内容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方面，以宗法等级伦理关系及其秩序为核心。就其性质而言，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奠基于小农宗法等级社会。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儒学及其礼教文化，是小农宗法等级社会的伦理文化，它所反映与代表的是农业社会的宗法等级制价值精神，维护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既有的文化传统，如果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新生，它与当代公民社会及其公民精神在根本上就不相容。

另一方面，传统儒学所关注的主题，如成人、治世等，以及包含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及民生、民本内的作为理性实践的一般价值要求，具有永恒性。它们或者是人类社会生活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永恒问题，或者是人生在世或社会生活的一般价值要求。而传统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条件下，亦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具有永恒性的问题做出了某种积极、严肃的思考与回答。正是这种思





考与回答，才使得传统儒学自身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延续。

## 三、传统进入现代的方式

1. 传统以何种方式进入现代？这个发问不是外在空间的（插入、挤进、置放等），不是简单地指称使传统直接成为现代的，而是在内在生命的意义上，在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意义上提出。因而，这个发问就可以转换为现代如何存在于传统中？我们现代精神文化创造活动如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一部分，并使中华民族传统在现代中获得新生，进而使现代本身就成为一种传统？

传统（精神或道德文化）——这里的传统是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内容，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入现代：

其一，问题域的存在与澄明。人类在其生存过程中，总会面对一些永恒的问题，诸如人自身形神关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等。这些是人类所永远面临、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在不同的文明演进历史时期，总会对其做出自己的探索与相应的回答。这些具体回答是特殊的，因而，具有具体、有限性，难免讹误。但是，这些特殊回答背后则隐藏着某种普遍的精神，这些精神可能是超历史、时代的。一切后来人，如果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么，就总是要在人类既有文明基础之上前行，自觉把握人类生活中的这些普遍、永恒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理解路向。一切理性的后来人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澄明这些问题及其永恒精神。这种澄明总是自己时代中的澄明，是自身时代生活实践的理论表达。

人生问题、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社会秩序及其正义性问题、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等，是人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须永恒面对的问题。中华民族在自身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以自己的智慧方式对此做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在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灿烂的一笔。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即是其结晶。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演进的具体路径差别，对同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提出、思想、回答方式，然而，这些差别并不能遮蔽那些作为人类须永恒面对的问题域本身的存在，不能遮蔽不同回答方式中所包含着的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智慧。这些智慧，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这些问题探究所取得的文明成果。

其二，文本的诠释。能够构成一个民族文化核心的东西，总是有一些标志性内容。这些标志性内容，既有内在精神的，亦有外在符号象征的。一个文明总是借助于某种符号象征（如文本）将传统延续。这个文明的传承延续过程，既是一个文明的一脉相承过程，亦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过程——这是文明传承中所谓文明演进路径依赖的内在演进逻辑。这种文本标志性符号，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象征，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一个有历史的文化创造过程，总是通过文本诠释的方式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传统概念、范畴因为其文化承载性，就会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与“图腾”。

在总体上言，西方文化以《圣经》为基础，东方文化以儒学四书五经为基础。欧洲现代社会以“自由”为时代精神。这个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自由”精神，却正是在宗教改革这一欧洲由中世纪走向现代的黎明曙光中生成。宗教改革被黑格尔称之为作为“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①] 路德通过对

①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圣经》的翻译诠释，使《圣经》变为一本“民众的书”，进而使“每一个人都享有从《圣经》取得教训的权利，能够使他的良心遵照《圣经》行事”。路德的这样一件工作引致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价值精神的“原则上剧烈的改变”：在宗教的范围内宣扬与确立起“基督教的自由”精神；在欧洲竖立起一面“新旗帜”，这就是“自由精神的旗帜”，人民在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这面新旗帜揭示了一个新道理，真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没有一个阶级占有着‘真理’的内容”，“人类靠自己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①] 宗教改革为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空间。从文化、精神的角度看，欧洲人正是通过《圣经》这个文化本源之文本的诠释，获得了走向新时代的新精神。这种诠释不仅使这种新精神拥有自身传统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基于这种传统资源的价值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传统儒学在诠释中生长。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起，中国古代社会就为全民思想定于一是。这在奠定民族文化一统的同时，亦确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在全社会价值精神中的独尊地位。不过，以独尊儒学为是的道德价值立场，却在中华民族开放的历史生活过程中使传统儒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长方式。这就是：传统儒学作为民族文化之躯体在不断被重新诠释、获得新的内容中生长，并通过这种诠释获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存在的生命力。唐代佛教传入后的彼此相融，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诠释，均是传统儒学以及以传统儒学为标识的中华民族文化及其道德精神的突破性生长。如，宋明儒学尽管同样是奉四书五经为圭臬，但此时的儒学

①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 428—43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